

■ 教育数智化

DOI:10.15998/j.cnki.issn2097-6763.2026.01.008

数智时代高校德育治理中的 技治主义及其超越



蔡连玉,廖承芳,王宪平

(浙江师范大学 高质量发展研究院,金华 321004)

摘 要:在优绩主义主导的高校整体运行机制中,德育治理被优绩哲学的“技治主义”所裹挟,推崇“科学管理”和“专家政治”的“技治主义”似乎为高校德育治理困境找到了出路。技治主义在社会治理数据技治滥觞、德育人本性缺失的时代情景中,以自身的技术理性从“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3 个层面嵌入对学生的行为规训与思想引导,搭建以综合测评为核心的积分量化体系,推动德育工作可视化,且以专家决策的合法性保障高校德育层级有序运行。然而,颇具功利色彩的技治主义在促进高校德育治理“科学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德育内在生命性物化、德育主体间性被悬置、德育伦理尺度被遮蔽三重风险。为规避这些风险,高校德育治理应超越技治主义,复归人性关怀,还原人之主体性;以价值理性为旨归,超越技术之宰制;明确专家角色定位,构建德育共同体,以此回归德育育德育人本位。

关键词:数智时代;高校德育治理;技治主义;技治超越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6763(2026)01007810

在日益以优绩主义作为底层逻辑的高校整体运行机制中,在“可看见”“可量化”的发展功绩追求中,高校德育因其效果的“不确切性”和效应的“非直接性”,在量化考评体系中陷入被虚化的困境。继而,作为一种以技术理性为主导的治理方式,技治主义所提供的“科学管理”和“专家政治”思维为高校德育治理纳入优绩主义机制轨道提供了工具与合法性,从而为高校德育走出困境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实践中,高校德育治理遵循“有数据有真相”的信念,在专家制定的规则秩序中,使数字技术长

修回日期:20250903

基金项目: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重点课题“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高校绩效管理综合改革研究”(2024GH085)

作者简介:蔡连玉,男,安徽宿松人,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廖承芳,女,湖南武冈人,浙江师范大学硕士生,主要从事高校德育研究;

王宪平,男,浙江建德人,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大学内部治理研究。

引用格式:蔡连玉,廖承芳,王宪平.数智时代高校德育治理中的技治主义及其超越[J].重庆高教研究,2026,14(1):7887.

Citation format:CAI Lianyu, LIAO Chengfang, WANG Xianping. Technocracy and its transcendence in university moral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2026,14(1):7887.

驱直入,广泛应用于运作过程之中。然而,学界对技治主义在高校德育治理实践中渗透的因与果的反思尚需深化,对建基于此的技治主义德育治理风险应对路径之探索则具有实践价值。

一、技治主义及其在高校德育治理中的表征

(一)作为治理理念的技治主义

“技治主义”起源于西方,从词源上看,技治主义(technocracy)由希腊语 techne(技术)和 kratos(权力)组成,也有学者将其译为“科技治国论”“技术统治论”“专家统治论”等^[1],最早由美国工程师史密斯(Smith)在1919年《工业管理》杂志上的3篇文章中提出,意指借助科学技术和专家实现工业民主的理性化。罗斯扎克(Roszac)给技治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技治主义意指工业社会用以达到它的有组织整合的顶峰的社会形式,它是人们谈到现代化、时新化、理性化、计划化时通常考虑的理想。”^[2]贝尔(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对科技治国论思想的理解是,“在这种政治制度中,决定性的影响属于政治部门和经济部门中的技术人员”,因此,科技治国论者是“以其技术能力而行使权力的人”^[3]。整体观之,虽然关于技治主义的定义变种颇多,但其核心内涵始终围绕科学管理和专家政治展开,即主张由掌握系统自然科学技术的专家运用科学思想和技术方法来治理社会^[4]。技治主义并非止于一种观念或思潮,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受凡勃伦(Veblen)等人思想的影响,在斯科特(Scott)等人的领导下,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中心爆发了北美技治主义运动(American Technocracy Movement)^[5],此次运动将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科学家推上神坛,试图运用其所具备的科学知识、专业技能来提升社会管理的效率。由此可见,技治主义的有效性在于其认识到了科学知识在处理复杂社会问题时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同时挖掘并发挥了各领域专家决策的权威性,从而保障社会运行的高效性。

然而,技治主义背后也蕴含着唯技术至上及民主性缺失的双重意蕴。波兹曼(Postman)从人文主义视角向技术垄断论者发出警告。他指出,在教育、法律、艺术等领域,人的情感、意志、信念无法通过技术的手段进行衡量,且当技术程序和人的用意并不匹配时,技术的强行使用暴露了技术入侵者的无知^[6]。芬伯格(Feenberg)从民主社会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无论技治主义被欢迎还是被憎恶,这些决定论的基础没有给民主留下任何空间”^[7]。技术分析主宰下的专家决策将民众参与从社会公共事务中分离,民众的社会诉求被排除在外,整个社会分化为专家和专家之外的两大群体。因此,随着数字技术跻身为新时代的技术代名词,思考如何在技术的蔓延与生发中取得技术赋能与风险防控的平衡,将为技治主义注入新的说服力。

(二)高校德育治理实践中的技治主义

技治主义主张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和专家政治来管理和解决社会问题,强调技术理性的重要性,凸显科学技术专家在社会管理中的主导权,以实现决策制定和落实的权威性和高效性。德育不同于管理,更不同于社会治理,德育的对象是人,是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长期且深远的教育活动^[8]。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领下,高校德育是旨在引导大学生“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系统性教育实践。其中,“明大德”指向政治认同与理想信念的国家层面要求;“守公德”指向行为规范与社会责任的社会层面要求;“严私德”指向道德修养与人格完善的个人层面要求^[9]。随着社会工具理性的扩散,高校在“质量审计”中日益追求德育成效的量化指标,为了将育人过程纳入“投入—产出”式的可衡量体系,技治主义于这3个层面的实践中,以其独特的逻辑渗透并重塑高校德育的治理样态。德育工作者在考核指标驱动下,越来越多地将重心转向技术手段,依托数智技术建立全方位数字化德育体系,以实现对学生的行为规训与价值引导,凭借德育评价的精细指标化搭建以综合测评为核心的积分量化体系,依靠德育“专家”决策落实行政主导下的规范制定与执行,进而推动德育成效短期可视化。

技治主义在高校德育治理中的首要表现为技术嵌入下的行为规训与价值引导。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高校德育治理模式正被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重塑。这种重塑并非笼统的数字化,而是精准地对应到了立德树人不同层面。在“明大德”层面,技治主义主要通过线上学习系统实现对学生思想引导的量化追踪。在“守公德”与“严私德”层面,核心是通过全景式监控实现对学生行为的数据化规训。校园内的摄像、门禁打卡、晚归记录等系统,将学生在宿舍、图书馆等公共空间的日常行为转化为可供分析的数据。不同于传统以教师讲授为核心,使受教育者理解和熟记德目内容为目的的“德目”教育^[10],能通过大数据技术整合学生多维度的信息,对其行为习惯和行动倾向进行有效预测。德育工作者可以依据这些数据记录,及时捕捉到学生的不良行为倾向,以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治理效果。

以综合测评为核心的积分量化体系是高校德育治理技治化的第二个关键表现,它构成技治主义在德育评价中的核心逻辑。当前,高校普遍采用积分制,通过“细则化”和“量表化”手段,将复杂的德育内涵转化为可计算的指标^[11]。该体系常以“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维度,将学生在校行为全面纳入量化轨道。例如,参加志愿服务可为“守公德”加分,宿舍卫生不合格则在“严私德”上扣分,获得思政竞赛奖项则能提升“明大德”分数。这些分数最终汇总为“德育总分”,直接与学生的奖助学金评定、推优推免及就业推荐等切身利益挂钩。整体而言,以综合测评为核心的积分制已成为高校德育评价的“标配”,将德育的宏大目标细化为可操作的数值化指标,使原本抽象的品德评价变得有迹可循、可比可算。这充分体现了技治主义通过量化管理来改造德育的本质,是其在高校德育评价中最具代表性的实践形态。

高校德育治理技治化的第三个表现是“专家”决策主导下的规范制定与执行,是实现德育评价指标化逻辑的权力保障。高校德育治理的核心任务在于协调,以期发挥德育的整体功能。专家化是技治主义在社会治理中的表现,即以技术理性的名义用专家决定取代公众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争论^[12]。在当前科层管理大背景下,在高校德育治理过程中,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高校德育工作者凭借行政权力和德育经验,享有德育“专家”形象,主导了从德育评价指标到学生行为规范的整个制定过程。这种“专家”决策化最直接地体现在指标化评价体系的构建中。综合测评的积分细则,包括加分与扣分的行为及权重,均由这些“专家”设计和定义,而被评价的学生在此过程中几乎没有话语权。这实质上是将复杂的德育问题简化为技术性管理问题,并通过“专家”权威将统一的量化标准强加于全体学生。这种决策模式也贯穿日常德育管理。在校园场域,各级各类德育工作者以内隐的“专家”话语权直接确定学生日常生活的运行逻辑。正如福柯(Foucault)的微观权力理论所揭示的,权力往往通过知识来维系^[13],德育工作者通过制定评价标准,将自身的权力嵌入操作性知识中,使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内化这种规训逻辑,从而强化技治主义在高校德育治理中的权威性。

二、高校德育治理中技治主义彰显的归因分析

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的技术理性揭示了科技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使其成为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核心要素。现代社会依赖技术理性作为其运行的主要动力,促进各个领域的拓展与演变。高校德育从现代社会里生发出来,且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人本性缺失困境,技术理性由此渗透到高校德育治理实践中,并形塑着高校德育的整体治理样态。

(一)社会治理中的数据技治应用

传统的技治主义将科学技术和专家统治捧上神坛,相信科学可以为我们开辟一条最光明的道路^[14]。在后信息时代,数据跻身为新时代的技术代名词,以算法设计调控着整个社会的运行。在传统技术治理偏好和时代数据主义的双重加持下,依据数据预测进行自动化的精准控制与决策的数据

技治主义应运而生^[15]。且随着当前社会要素的高速流动,要素之间异质性加强,传统的经验治理面对治理生态的不确定性、治理问题的复杂性和治理需求的多样性^[16],已然“力不从心”。数据技治驱动下的社会治理数字化改革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从实施现状来看,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新型治理框架已陆续构建起来,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已逐渐呈现^[17]。在城市社区应急治理中,通过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对社区各类主体及活动过程进行数据采集和统一管理,为社区应急治理全过程提供数据支撑,实现风险的预测预警、决策的科学制定、应急物资的合理储备等,以提高社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18]。在乡村韧性治理中,坚持用数字化来推进产业融合,增强了乡村发展活力;数字乡村大脑技术体系助推乡村治理的精细化;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韧性治理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有效回应了村民的需求^[19]。在智慧城市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数智技术的运用已经重构了信息交流整合与监督方式,助力完善多元协作治理网络^[20],实现了风险被动应对向主动感知逻辑的转变,使治理趋于数字化和智能化^[21]。数据技治支撑下的数字治理实践在社会各领域愈演愈烈,高校德育作为社会大集合中的一项人类活动,在全社会数据技治的浸润下,也展现出了德育治理数字化的技治主义色彩。

(二)高校德育治理中的人本缺失

基于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高校德育治理应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的,并以“以人为本”作为根本遵循。然而在实践中,受传统儒学和苏联教育理念的深层影响,高校德育内部长期积淀着“顺从性”取向。在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潮流下,经济理性和计算理性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物化”逻辑逐步侵蚀发展进程中本应坚守的价值理性。由此,高校德育治理在传统规训与现代绩效逻辑的叠加作用下,呈现人本关怀的缺失,陷入德育治理优绩化、学生主体游离的双重困局。

首先,德育治理优绩化。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在新管理主义模式下禁锢于绩效评估和质量审计等外部规制手段^[22],在追求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计量化、指标化的治理手段不断化约了教育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在力求跻身于“顶尖高校”的治理逻辑下,高校整体大发展呈现优绩至上格局,学生成长的动态性、发展的内生性被优绩追求下的短期绩效产出所遮蔽。高校德育治理在高校整体发展的联动下,也呈现一片优绩主义的繁荣。然而,德育内部丰盈的生命性、本真性、创造性意涵却在指标化运作中被逐层弱化。借助对事实领域的数字化具象评价取代学生价值领域的柔性发展,高校德育治理体系得以在体制上被“充实”,却在实质上窄化了学生的存在空间。

其次,学生主体游离。美国著名道德哲学家弗兰克纳(Frankena)指出:“道德的产生是有助于个人好的生活,但不是说人是为了体现道德而存在。”^[23]高校作为大学生学习和成长的主要场所,本应该以培育其社会责任感、终极信仰为重任,但在经济理性弥漫的语境下,学生逐渐被置于外在功利目的的工具化位置,主体地位被削弱。学生由德性生成的主体,转变为制度安排与绩效逻辑的客体,这为德育治理的技治化提供了现实土壤。从德育生成逻辑看,高校德育本应遵照“道外化—德内生”的基本路径^[24],通过外在引导促进学生内在道德自觉的生成。当学生主体主动性缺失,其内生性的培育机制便随之弱化,德育治理也更倾向于依赖外部化、可操作的治理工具来维系运转。在此情境下,数字技术与量化评价等手段便顺势进入德育场域,不仅成为维持德育运作的重要支撑,也为技治主义在高校德育治理中的渗透提供了通道。

(三)技术理性驱动德育治理可视

技术理性指的是围绕技术实践所形成的“目—合理”的行为方式,其核心特征在于以工具行为与理性抉择为手段,实现对现实问题的高效处置^[25]。在数智时代“专家主导”的教育管理体制大背景下,以数字技术为核心优势的技术理性可实现德育治理成效可视化,继而呈现经济理性视角下高校高

质量发展样态。

在德育实施过程中,以数字化为表征的德育过程已经构建。不同于传统经验主义德育,数智时代德育对象处于全景敞视监控下,所收集的信息呈指数级增长趋势。全体德育对象的行为表现、动态发展不再藏匿于“思想的黑匣子”里,而是借助大数据的广泛性、便捷性和统筹性被实时呈现。在此条件下,高校德育工作者将数据规律和德育规律加以结合,对所收集的海量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以此判断德育对象整体的道德发展水平。同时,立足大数据的归类筛选功能,便于选取部分对象开展深入的因果分析以精准把握外显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情感,在技术手段的辅助下,进一步促成德育对象的道德发展水平和个性特征整体可视。

在德育成效评价方面,以指标化测评为核心的德育量化评价范式已然形成。德育评价是人们依据一定的评价标准,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正确的途径,多方面搜集适切的事实性材料,对德育活动及其效果的价值作出判断的过程^[26]。不同于以往以教师直观感受为主的小样本化质性评价和单一的等级评价,大数据为德育评价赋能,实现学生品德发展个性化评价可视。数智时代背景下每位学生享有自己的数字身份,德育空间由现实空间和赛博空间交叉形成。通过持续记录、统筹德育对象现实空间的细节信息和赛博空间的浏览记录、评论感想等,德育对象的内在精神性以维度、指标的形式呈现。由此,德育工作者借助离场化算法分析,使学生品德发展个性化评价以“客观科学”的方式可视成为可能。在学生品德评价可视化的基础上,高校德育治理成效得以外显化,并以指标形式纳入高校综合考核制度评价体系,使高校“大发展”可视化显现。

三、高校德育治理技治化遭遇的三重风险

从短期来看,将技治主义融入高校德育治理可以提升效率。一方面,推崇专家治理符合功利主义价值观,便于管理者对学生实施统一化管理。另一方面,将大数据融入高校德育,能提高德育过程的可视性、可控性与可预测性。但从长远看来,技治主义在高校德育治理过程中的滥觞会衍生出非理性的后果,过度夸大技术和专门人员在德育治理过程中的作用,虽然会为高校德育带来一定的形式绩效,却会因此忽视德育自身的价值理性,催生一系列的问题。

(一)德育内在生命性物化

在德育治理技治主义规训下,以大学生为主要教育对象的高校德育呈现鲜明的数字景观,德育方式数字化、德育评价量化已然成为现实。在数字化德育体系中,学生的道德发展都以数字化的形式记录和呈现,这有助于提升治理的可视性。但如果过度依赖数据分析覆盖德育全过程,最终将引发高校德育轻视人的生命经验和生命品质的内在质感、忽略人作为人的内在精神变动的复杂性危机^[27]。

其一,学生的品德完整性有被分割窄化为数据要素的倾向。学生作为存在主体,自身就是一个整体,其品德发展的本质更是一个整体过程,涵括道德需要、情感、意志与行为的相互作用。然而,外显化的数字测评往往依据日常行为习惯、学业表现、社会实践等具体维度进行量化呈现,难以全面揭示其背后的隐性协同机制。在此种片面化的德育评价范式下,集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为一体的品德发展将被压缩成物质世界中的行为表现及数字化评估,内植于品德进程的生命性、价值性便无从谈起,由此将引发“只见数据不见人”的德育假象。

其二,学生品德发展的生成性有被静态数据虚化的可能。蓝德曼(Landmann)指出:“自然只是使人走完了一半,另外的一半尚待人自身去完成。”^[28]学生品德发展的过程一半是在教师引导下、环境约束下展开的,一半是学生自我塑造、自我生成的结果。然而,在数智时代,客观化的数据分析虽能较为准确地呈现学生的外显行为,却往往以静态方式界定学生的发展状态,更侧重外界环境对学生的约

束成效,相对忽视了学生内在潜能的生发过程。这种治理模式的持续,使学生对于道德的理解与认同局限于规则的遵守与行为的模仿,从而削弱其自主选择与深层自我认知能力。

(二)德育主体间性被悬置

马克思在交往理论中指出,主体间性是指主体之间双向互动、双重融合的关系,是不同主体通过共识关系表现的相关性和统一性^[29]。德育本质上是一个多主体平等参与、互动建构的过程,其生成依赖于教师与学生、同伴之间的双向交流与情感共鸣。然而,在德育治理技治化过程中,德育主体间性的发展也面临一定的悬置风险。

首先,德育主体易被技术异化。随着智能终端和数字平台在高校中广泛应用,学生的日常行为被持续记录和分析,德育工作者以“瞭望者”的身份掌握其动态信息。此种模式虽然提升了德育治理的效率,但也面临于无形中将学生拼凑为“数字集合”的风险,从而弱化其作为人的主体性。若德育工作者过度依赖技术带来的客观与高效,忽视对技术应用的反思与调适,就容易在不自觉中成为算法逻辑的附庸。

其次,真实的交往实践面临被虚拟互动挤压的挑战。德育过程中主体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双向且互动的^[30],而在数智时代,高校德育工作者与学生之间的交往更多借助于数据反馈与虚拟化的信息呈现。虽然大数据分析能够帮助教师快速形成学生的整体画像,并对学生的行为模式进行较为准确的把握,然而在此过程中,学生处于被动认知地位,且德育工作者借助大数据建构的对学生整体形象的认知是剥离现实情境的。由此,若德育工作者仅依靠大数据对学生进行单向度的感知,德育关系的互动性可能因此受到影响。整体说来,在利用大数据提升宏观治理能力的同时,还需辅以观察、访谈等现实交往形式^[31],以挖掘学生的动机、情感和潜在需求,实现知、情、意、行的整体协调。现实的情形是,高校德育中宝贵的主体间性正在因技治化德育治理而流失。

(三)德育伦理尺度被遮蔽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最早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野,德育治理方式全方位数字化彰显了工具理性,实现了德育过程的可观察、可测量,但这种趋势也带来了遮蔽德育“育德”之价值理性的可能,并衍生出潜在的伦理风险。

其一,学生隐私存在被侵犯的风险。全景式监控以保障学生安全、及时规范学生不良行为为初衷,但若数据的采集、存储和使用权限缺乏严格的伦理约束和程序正义,则极易侵犯学生的个人隐私。在自动化和隐蔽化的数据采集过程中,学生的行为痕迹被无意识记录,个人几乎处于“透明状态”。更严重的是,当数据的使用与整合缺乏学生充分的知情同意和严格的权限限制时,一旦数据泄露,在算法的推算下,学生的个人隐私将面临被严重入侵的风险。

其二,真实情感联结易被技术化流程所漠视。休谟(Hume)认为:“没有道德情感,就没有道德行为,只有当下直接的情感才能激发意志,产生行为。”^[32]但在数字化德育治理景观下,师生互动容易被简化为量化评价与数据反馈。在此过程中,位于数字两端的工作者和学生之间彼此传播和流动的只有“数字符号”和程序化的活动设置,而触及人心的情感唤起与人文关怀的发生机制和实践空间则可能被压缩^[33]。

其三,统一的算法潜在地规训学生个性。在高校德育治理中,通过算法设计可落实高校德育管理准则,借助算法治理模式可提升治理效能^[34]。但在算法操控下,该治理模式会激发学生以迎合算法指标为行动目的,从而忽视行为背后的真实价值取向,个体独特的道德发展过程被窄化为可在数字评估体系中测量的元素^[35],久而久之,学生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向度就会被磨平,从而培养出“单向度的人”^[36]。

四、高校德育治理超越技治主义的路径

随着技术社会化和社會技术化的加剧,技术治理成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种重要治理路径^[37]。在技术治理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高校德育治理也呈现技治主义特征。虽然数字技术运用有利于显性德育目标达成,但高校德育治理也由此遭遇三重风险,因此应遵循如下路径超越技治主义局限,使高校德育回归立德树人本位。

(一)德育治理复归人性关怀,还原人之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认为,人是实践的主体,是自身发展的主体,人是在实践中自我生成、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38]。由此可知,人是一种主体性、共生性的存在,具有行为的自主性、交往的能动性和超越性。高校德育治理为实现人性的复归,必须从对人的重新认识出发,正视现代社会情境下人的异化状态,回应社会发展与大学生主体的现实诉求,重建以“人”为中心的人本德育治理体系。首先,以人为本是社会健康发展对高校德育治理的内在要求。社会发展需要的是具有自主精神和责任意识的“完整人格”的人,而不是“工具化人才”。高校作为价值引领的重要场域,其德育治理更应培育能抵御功利化冲击、具有公共精神的群体。其次,以人为本是学生作为德育主体的直接诉求。与中小学基础行为规范内化为主不同,高校德育面向的是处于价值观定型与人格成熟关键期的大学生。从主体性理论出发,大学生希望自己不只是德育活动的被动规训客体,他们渴望通过校园、社会互动及其自我反思实现价值建构,从现实的“实然自我”不断迈向理想的“应然自我”。大学生既渴望独立与自由,又面临社会化、职业化的压力,且并非抽象的“积分个体”,而是带着复杂道德困惑和生命经验的真实存在。鉴于此,高校德育治理应以满足学生内在道德需求和情感为依托,通过多元化的互动体验,引导其品德的自我建构,其核心是培养独立、理性、自律、自为的大学生道德人格,而非被动的、合格的“守纪者”。再次,时代要求高校德育治理要以人文关怀为主基调。当下“物化”德育常将学生当作可以被外部指标随意刻画的“白板”,以分数与积分替代学生的道德自觉,从而削弱了德育的生命性,高校德育被抽离成“空中楼阁”,所培育的人容易演变成“伪君子”形象。相反,时代呼唤高校德育通过关注学生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唤醒,让他们在校园生活和社会实践中亲身体验责任、共情与关怀。只有将真诚、非功利的人文关怀作为德育治理主旋律,才能把大学生培养成有血有肉的“有情人”,实现其人格的独立与德性的完善^[39]。

(二)以价值理性为核心旨归,超越技术之宰制

科技兼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双重特征,但当科技在社会中被推崇为无所不能的发展手段时,往往容易退化为单向度的工具理性^[40]。在高校德育治理进程中,如果仅仅依赖技术来提升效率、维持秩序,而忽视德育活动本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德育内在的价值性将会遭到严重侵蚀。因此,需要明确价值理性为德育第一性,在数字化德育空间里,加强德育工作者的技术胜任力,注重技术反思,杜绝德育主体被算法奴役。首先,高校德育治理须确立价值理性优先。在优绩主义的裹挟下,高校德育治理运行也陷入“投入—产出”陷阱,对于外显指标的追求超越了对人性的关怀。在此种功利的德育治理模式下,学生之间的交往将被竞争所取代,人的生命价值将被工具性价值所取代。因此,高校德育治理必须回归立德树人本位,将情感关怀、人格成长置于制度设计与实践的首位,通过回归人性以突破科层制、计算逻辑的桎梏,从而强化对学生的关怀、对生命情感的关注,从人性的本真出发,引导学生获得自我成长,收获健全的人格。其次,需提升德育工作者的技术胜任力与价值辨识能力。数字化技术使高校德育治理跨越现实与虚拟,延伸到学习平台、学工系统、科研诚信等多个空间,因而数字化德育体系要求德育工作者以德育理性为“底座”,缩减技术的负面效应,避免成为“算法的执行者”。

在数据收集,要保护好学生的隐私,避免数据泄露。在德育评价时,需将大数据的相关性分析与小样本的因果分析结合,学会识别数据背后的动机与情感。再次,要强化技术反思,避免技术宰制。海德格尔(Heidegger)曾指出,技术不可能是中性的,任何技术的发明都带有价值倾向^[41]。因此,在日益数字化的高校德育治理体系中,德育工作者要坚守自身德育主导者地位,明确技术只是作为工具出现,以提升高校德育治理效能为目的,且算法的设计必须以符合德育规律为前提,而非单纯追求“可见性”与“可控性”。同时,教育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德育工作者需要主动关注德育与技术使用之间的张力,探索如何在虚拟平台、混合课堂和网络思政中嵌入更多人文关怀,使数字技术成为拓展大学生主体性和情感体验的工具。

(三)明确德育专家角色定位,构建德育共同体

美国学者小罗杰·皮尔克(Roger Pielke Jr.)将技术治理中的专家分为4类:纯粹的科学家、科学仲裁者、观点的辩护者和政策选择的诚实的代理人^[42]。在高校德育这一特殊场域中,治理任务并非“规定学生该如何”,而是要在制度与自由之间寻找平衡。由此,高校德育工作者不应扮演“观点辩护者”,将个人利益或行政逻辑包装为“科学决策”,而应扮演“诚实的代理人”,推动多元要素的协同与沟通,构建开放而多元的德育治理共同体。首先,创立师生课堂教学德育共同体。不同于中小学,高校课堂更多的是学生价值引导和学术探索的空间。教师与学生应形成互动性的学习共同体,教师不再垄断德育话语,而是与学生共同探讨公共伦理议题,在平等交流中实现“共同善”的价值生成。例如,学术诚信案例讨论、社会调研成果汇报,都可以成为共建多主体联动下课堂德育生态的契机。其次,构建校内德育治理共同体。高校德育决策呈现自上而下的单向性,遮蔽了大学生作为德育主体的参与感和责任感。因此,校内德育治理共同体需以打破科层管理瓶颈为出发点,为多主体的主动参与和协同共治提供支撑^[43]。在价值目标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遵循,在追求全体成员德性完善的过程中,落实高校德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运作方式上,需创建师生对话、学工部门与院系的反馈机制,在校规修订、综合测评指标设定等环节引入学生代表的实质性参与,建立长期有效的沟通机制推动多主体协同治理,形成符合大学生成长规律的德育情境。再次,建立家校社协同的德育实践共同体。家庭是学生德性养成的起点,学校是学生德性发展的主阵地,社会是德育实效的试金石,三者纵横交错共同推动大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实现价值内化。在具体实践中,家庭要提升育德意识,提供情感支持与价值引导,做好学生德性发展的前置牵引;学校要坚守主导地位,发挥课堂教学、科研训练、校园文化的引领功能,当好学生德性生成的全过程导航;社会则通过志愿服务、实习实训、社区项目等提供德育实践的真实舞台,以检验并促成德育治理实效。通过三方协同营造良好德育生态,避免“专家独断”,促进高校德育治理对技治主义的超越。

参考文献:

- [1] 李醒民.论技治主义[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45.
- [2] ROSZAC T. The making of counter culture reflection on the technocratic society and its youthful opposition [M]. New York: Doubleday company, 1968: 56.
- [3]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高铨,王宏周,魏章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85386.
- [4] 刘永谋.技术治理的逻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30(6):118127.
- [5] 刘永谋.技术治理的哲学反思[J].江海学刊,2018(4):4652.
- [6] 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6.
- [7] FEENBERG A. Questioning technology[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75.
- [8] 姜海滨.人性向度的复归:“关怀”是高校德育工作新路向[J].中国青年研究,2020(11):8793.

[9] 王晗宁. 时代新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文化底蕴探究[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3(43):3336.

[10] 史宏协. 德目主义的困境:兼论研究生德育的拓展[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5):9294.

[11] 刘振天. “去指标化”:高等教育评价和质量保障的后现代转向[J]. 中国高教研究,2025(8):713.

[12] 刘永谋. 安德鲁·芬伯格论技治主义[J]. 自然辩证法通讯,2017(1):124129.

[13]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09.

[14] 马森·魏因加. 专业知识的民主化:探求科学咨询的新模式[M]. 姜江,等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56.

[15] 王婧,潘平. 数据技治主义对生态环境治理与决策的哲学分析[J]. 安徽文学,2018(6):98102.

[16] 刘彤,左琦. AI 赋能智慧城市数字化治理的关键技术与典型应用[J]. 科技智囊,2024(5):5662.

[17] 郑春勇,张婷婷. 西方技治主义思潮及其对当前中国的启示[J]. 文化软实力研究,2022,17(2):6372.

[18] 刘超,兰双涛,陶志刚,等. 数字技术赋能中国城市社区应急治理的内在逻辑和实施路径[J]. 中国应急管理科学,2024(5):107117.

[19] 白启鹏.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韧性治理及其行动框架[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3543,169.

[20] 陈弘,王清贵. 数字技术赋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基于整体性分析框架[J]. 生态经济,2024,40(6):179-184.

[21] 庄国波,张胜,贺珍. 数智技术赋能安全韧性城市治理:生成逻辑、潜在风险与优化路径[J].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4):7380.

[22] 王思懿. 新管理主义情境下全球学术职业的变革与坚守:基于组织专业主义与职业专业主义分化的视角[J]. 外国教育研究,2021(6):3345.

[23] 威廉·K. 弗兰克纳. 善的求索:道德哲学导论[M]. 黄伟合,等译. 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47.

[24] 张成林,曾俊豪,杨翠. 人学视域下高校德育的现实藩篱与理路建构[J]. 高教探索,2024(1):9498.

[25] 高亮华. 技术理性问题探讨[J]. 哲学研究,1993(2):6478.

[26] 鲁洁,王逢贤. 德育新论[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434.

[27] 金生铉. 大数据教育测评的规训隐忧:对教育工具化的哲学审视[J]. 教育研究,2019(8):3341.

[28] 蓝德曼. 哲学人类学[M]. 彭富春,译. 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245.

[29] 张凤. 主体间性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艺术研究[J].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24(2):3741.

[30] 余灵灵. 哈贝马斯传[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83.

[31] 袁文娟. 工具理性的超越:大数据技术背景下高校德育的三重变革及其应对策略[J]. 高教探索,2022(6):118-123.

[32] 休谟. 道德原则研究[M]. 曾晓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89.

[33] 冯锐,孙佳晶,孙发勤. 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风险与理性抉择[J]. 远程教育杂志,2020,38(3):4754.

[34] 崔天. 社会治理中的技治主义:现实困境、逻辑转换与重塑路径[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22(8):6066.

[35]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M]. 章艳,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93.

[36]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刘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3.

[37] 陆群峰. 超越技治主义:重思专家专长与专家角色[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2,39(4):6873.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0.

[39] 范树成. 当代学校德育范式转换与走向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330332.

[40] 杨建国. 从“技治主义”到知识民主:环境风险决策的范式转型[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3):104110.

[41] 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 裴程,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0.

[42] 小罗杰·皮尔克. 诚实的代理人:科学在政策与政治中的意义[M]. 李正风,缪航,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14.

[43] 楼艳,郭立群. 构建高校德育共同体:教育生态学的视角[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3):8289.

(责任编辑:吴朝平 校对:杨慷慨)

Technocracy and Its Transcendence in University Moral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CAI Lianyu, LIAO Chengfang, WANG Xianping

(*Institute for High-Qual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Within the overall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universities dominated by meritocracy, moral education governance has been shaped and constrained by technocracy, which is grounded in the philosophy of merit. Advocating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expert politics” technocracy appears to offer a solution to the dilemmas faced by moral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characterized by the proliferation of data-driven governance in society and the erosion of the humanistic dimension of moral education—technocracy embeds its own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into students’ behavioral regulation and ideological guidance on three levels: cultivating great virtues (Ming Dade), upholding public virtues (Shou Gongde), and maintaining private virtues (Yan Side). It constructs a quantifiable points-based system centered 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o enhance the visibility and manageability of moral education, while relying on the legitimacy of expert decision-making to ensure the orderly functioning of hierarchical moral education governance. However, while technocracy promotes the “scientific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governance, it also entails three significant risks: the reification of the intrinsic vitality of moral education, the suspension of intersubjectivity among moral education agents, and the obscuring of ethical standards. To mitigate these risks, moral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universities must transcend technocracy and return to humanistic care, restoring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human person. It should take value rationality as its ultimate orientation to overcome the domination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clarify the role of experts, and construct a moral education community. Through these measures, moral education can return to its core mission of cultivating virtue and educating people.

Key wo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moral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universities; technocracy; transcendence of technocracy